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關係空間與鄉村發展：以北埔產業發展為例

計畫主持人：譚鴻仁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4
第二節 研究目的	5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鄉村發展的類型與分析	6-7
第二節 調節理論	8-11
第三節 品質治理	12-14
第四節 傳統理論	15-16
第五節 產區的建立	17-1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對策	19
第二節 質性研究與個案研究:優點與現制	20
第四章 北埔的地方發展	
第一節 前言	21-22
第二節 北埔的歷史發展	22-25
第三節 北埔歷史發展與聚落變遷	25-26
第四節 北埔現況與發展願景	27-30
第五章 台灣茶產業發展	31-35
第六章 椏風茶對地方的發展與影響	36-42
第七章 結論	43-44
引用文獻	45-47

圖次

圖 4-1 北埔鄉水系圖	22
圖 4-2 北埔鄉位置圖	27
圖 4-3 北埔鄉歷年人口數變化圖	28
圖 4-4 北埔鄉現住戶數變化圖	28
圖 6-1 極風茶與一般茶生產鍊比較圖	4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近年來關於農業發展的研究已逐漸地在政治經濟學的農業工業化分析之外，另行提出一個對農業生產與地方發展關係互動的研究取向，由空間網絡與商品生產及政、經、社會的治理來討論地方發展。由此觀點審視北台客家聚落的發展發現，十九世紀末客家族群因歐美市場對台灣茶的需求上升，使得北部的丘陵地、桃園台地等適宜茶葉生長的土地迅速被開墾，形成桃園與美、日、北非等國的茶葉生產之關係空間。但隨者外銷的沒落這樣的關係逐漸轉型為桃園、新竹之間槎風茶生產的關係空間(譚鴻仁，2007)。當時北部丘陵地的客家族群，發展茶產業的過程與轉型係鑲嵌在客家族群的族群與文化的傳統之上，在此轉型的過程中，經由農民自我技術提升，技術交流的關係建構以及政府機關的輔導轉型產生商品品質的提升，形成市場、生產空間的再結構。

在現有桃園龍潭由出口綠茶、包種茶轉型至兼做槎風茶之研究成果後(譚鴻仁，2007)，本研究希望進一步探索槎風茶的技術輸出地北埔如何在技術輸出的同時仍舊保有競爭的優勢與商品之區隔，而且持續維持這個族群商品之學習區域？同時探討北埔在鄉村發展的歷程與社會網絡運作中，鄉村發展如何透過產業轉型再結構地方的發展？

北埔的轉型主要來自民國九十年起開始全面實施週休二日。自此後國人假日休閒旅遊機會大增，進而影響鄰近都市的鄉村發展。農村地區的發展是由鄉村提供以下的需求所促成：(1)高品質的食物生產；(2)美好寧適的公共空間；(3)居住的土地與(4)環境保護 (Marsden, 1998)。Marsden (1998)的鄉村發展理論指出鄉村發展發生的過程是一個商品轉換與再生產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藉由在地商品重塑地方之文化與傳統，並透過市場與國家政策，影響了鄉村的發展與再結構。在此過程中地方的治理與調節機制也扮演重要的機制。地方轉變商品的生產，商品也轉換地方與地方間的關係，使得鄉村的發展形成空間關係的改變與再連結。

一、北埔的農村發展與對外關係

北埔鄉位於新竹市東南方，全鄉有五十六平方公里行政區劃分為九個村，人口約有一萬一千多人主要的居民為客家人，而多數人口集中於二十六公里的環山小盆地上，六成的人口集中在北埔、埔尾與南埔三村(台大城鄉基金會，1996)。清道光年間由閩、客、官方三者共同出資以武裝隘墾方式驅趕原住民而設立隘城，開疆闢土建立「金廣福大隘」，其拓墾範圍包括今日之北埔、峨眉、寶山三鄉，合稱大隘三鄉，以北埔為政經中心，主要的產業為茶葉、木材與煤礦(吳學民，2000)。北埔地方多為山坡地，可耕水田有限，農業多以茶葉與水稻為主。北埔因歷史發展由隘墾發展成的農村聚落，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使得今日仍保有相當完整的傳統文化地景與客家文化。

自民國七十年起，政府將北埔現有的古蹟與五指山風景區、冷泉等觀光點做規劃，同時配合民國七十六年台三線的開通，自此以後觀光休閒產業逐漸興起。北埔的傳統產業正在轉型，日常消費的商業活動以及服務業的重要性正逐漸在增加(*ibid.*)。根據地方人士指出，北埔的產業與景觀轉型主要有幾個因素：第一是週休二日的開始，第二是九二一大地震後，中部的觀光資源減少，第三是地方節慶，例如膨風節與柿子節的辦理。觀光客主要的遊憩空間為以慈天宮為中心的舊街區。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每逢週末假日，上百部的大型遊覽車以及為數眾多的汽機車載滿遊客進入一個非常狹小的舊街區觀光。這個現象在這兩三年持續不變。而多數攤販與商家販賣的商品也正顯示著同質化與去地方的現象(例如南投特產「不純砍頭」的蜂蜜與原住民烤肉等)。

相較於北埔舊街區觀光客集中於週末假日的現象，北埔的另一觀光區南埔，則擁有較平均的遊客到訪分佈。南埔村的遊客以公司旅遊與學校戶外教學為主，並且遊客停留的時間較長，約為四到八小時。在北埔地區，北埔舊街與南埔村此刻正進行著由下層結構(生產方式)造成的上層結構改變(地景與社會組織等)，客家文化若視為生產方式的上層結構，自然也面臨轉型與調整。

二、農產品的轉變與地區發展

1997 年後北埔開始以地方節慶的方式促銷與販售地方，形成較大規模的地方發展轉型。這段過程中，北埔所販售的商品由農產品的水稻與茶葉轉為地方或地方聚落所營造的客家聚落意象。同時，在商品轉移的同時，市場引導北埔成爲一個轉型的客家意象，這個意象配合多數遊客的短暫停留，觀光客的凝視調整地方成爲遊客能接受的想像：在客家地區消費客家食物，例如擂茶、柿餅以及聚落空間。地方上除了舉辦槿風茶製茶比賽，在北埔農村主要的農作物如茶葉、稻米、蕃薯等都逐漸地與觀光業結合，並定期舉行槿風節促銷鄉內農產品。

然而農產品不似其他工業產品，能夠標準化。北埔的茶葉製造過程雖有一標準程序，但對槿風茶來說，在製茶過程中仍然有許多的隱微知識（tacit knowledge）是無法用文字記述與傳遞的，例如對於茶葉生產中的攪拌過程時間長短，輕重的拿捏是無法用文字作標準的記述而傳遞與推廣的。這間接影響到農產品形成區域間的差異，例如峨眉鄉、龍潭鄉、石碇鄉亦有槿風茶但皆有不同特色。

農作物的品質通常關連到農作物與地方的關係，在討論鄉村發展中的商品化時，農作物的品質應該由其與自然環境、栽培方式以及地方文化、傳統的關係來探討。對應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主張鄉村發展的過程包含了三個要素：商品化，調節與網絡與行動者空間。Marsden 以此解釋英國鄉村在戰後的四種發展類型。在商品轉型的過程中，鄉村轉型過程所形成的網絡空間，除了地方間因空間再結構形成之分工網絡外，另有產品與地方之品質關係。當商品生產轉換時，也帶動了商品與地方的品質網絡改變，同時商品的生產也包含了特定的地方傳統。這些屬於地方的傳統，除了意涵商品與地方的關係外，也對地方是否可以形成關係空間，產生過濾的作用。地方再結構必須鑲嵌於地方原有的傳統之上。

三、政府與地方組織

北埔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地方將配合轉型來作調節，傳統的地方組織有其存在於傳統農業社會的價值。在社會轉型時的傳統的地方組織面臨到哪些挑戰？同時，它又對轉型中的社會造成何種的挑戰？以傳統的水稻生產與農會爲例，農會提供融資、技術推廣與行銷等功能，它也因此是北埔的主要民間組織，另外它也擔負了政治與社會功能等。然而在北埔幾次的地方節慶中，農會的功能不再彰顯，反而是由幾個地方社團負起主導的功能。北埔的南埔村休閒農業的例子也支

持產業關係與社會關係共變的看法。南埔休閒生態村的設立之後，原有的地方發展組織面對了一個挑戰：新的社區發展組織興起。南埔的地方人士因為必須要重新向地方與中央政府申請補助，所以在原有的社區組織之外，另行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重新結構地方與外部的關係網絡，如此一來，休閒產業協會方可以向外獲得支援，重新改造地方的基礎設施，便利資本的累積。但是這樣的變化卻遭致到原有的社區組織反撲，這個組織從成立到運作一直存在著一些困難。原有的社會網路如果代表著一種社會資本，那麼產業轉型造成的人際網路再結構就代表著不同社會資本的競爭，或者是一級產業下的社會資本妨礙產業轉型，而與第三級產業的社會資本相互競爭。

客家鄉民對於土地具有深刻的情感，其產業根植於土地。現今有關客家研究對象多以客家遷徙、語言變遷為主軸，較少探討深根於台灣土地之產業活動，北埔的鄉村發展與產業轉型潛藏了極富學術價值的研究觀點。在現今社會脈絡、經濟轉型下之客家農民如何面對強大外力競爭做出具特殊性的產業。本研究將北埔特有地方產業：槿風茶納入西方近來廣為討論的區域經濟，傳統理論與地方發展的架構下討論，預期將可使得本土經驗與西方理論做出交流。在學術上，本研究希望能夠整理客家產業以及鄉村發展的經驗。在地方發展、行動者網絡分析與傳統理論等理論對話；在其他社會科學理論上能夠藉由本研究的整理對「農村發展」以及「客家傳統」與「產業再造」等概念，提出跨學科的討論與辯證。本研究希望在研究的過程中對北埔的客家文化與茶產業發展歷程，分別做出完整的整理再以專文發表。同時對於鄉村的茶產業正積地希望拓展外銷，本研究預期可以提出相關的個別產業發展與組織學習與創新的專文供相關部門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探究有關客家聚落如何塑造在地特色與農產品的生產？如何應用地方資源與地方發展做結合，這樣所產生的新模式又是墊基在何種傳統基礎之上？根據上述研究背景的整理，本研究的具體研究目的有：

1. 研究北埔地區的產業轉型與客家文化轉型關連。北埔地區的客家文化是否有轉型的現象？
2. 探討北埔地區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由水稻、茶葉到觀光的商品轉移，其背景與變動關係。北埔的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在這個轉移的過程中的互動關係。文化商品化是如何發生的？
3. 提供本土經驗與西方論交互檢驗的機會。以 Marsden 之鄉村發展理論檢視北埔地方發展之商品轉換與關係空間及地方傳統鑲嵌之關連。

第二章 文獻回顧

鄉農村發展中除了農產品的改變之外，人類對鄉村的主要需求亦經歷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鄉村地區提供這些功能與都市或其他的地方，形成產業連結關係。

第一節 鄉村發展的類型與分析

鄉村地區的發展在關係網絡的概念下，可能會形成不同的發展類形，而造成地方的不均等發展，Marsden(1998)因此提出四種鄉村發展的理念型 (ideal types)，Marsden(1998:17-19)的四種類型如下：

一、保存的鄉村(preserved countryside)

鄉村保存的呼聲主要是由地方上的保護主義者與反發展的支持者所主導，這些人對鄉村發展的態度，是希望鄉村地區僅提供休閒產業以及住宅的開發。在這種發展模式下，常引起地方中產階級的保存主張與經濟成長與發展主張的衝突。這種保護的訴求主要在英格蘭南方與一些風景宜人與交通便利的北方。

二、競爭的鄉村(contested countryside)

競爭的鄉村的地理位置主要在大都市外圍的通勤區；發展衝突主要來自鄉村地區的新舊居民。主張發展的人士為農民與開發商，他們希望聚落周圍可以做農業以及工業發展，但開發計畫則造成在都市工作的居民反對。

三、世襲的領地(paternalistic countryside)

世襲領地是指大片的私人土地與農莊。私人擁有的大片土地與農莊的農業收

入逐漸下降，而地主尋求轉型以提高土地所得，通常以租、售土地或建築來構成提高土地所得。這種開發轉型較前兩種模式引發的爭議與衝突較少。

四、依附的鄉村(clientelist countryside)¹

依附的鄉村為發展遲緩地區 (less favoured areas) 或其他缺乏開發條件之偏遠鄉村地區。依附式的鄉村經營農業需政府的補貼。依附型的鄉村可能成為企業棄置或處理廢棄物的掩埋場或工廠，或依賴於國家公園提供的工作機會來做國土的保育與發展。在英國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下，許多公共設施被私有化，而依附型的鄉村就成為發電廠、工廠、掩埋場之類的設施設置地。

Marsden(1998)指出英國的鄉村在後生產的時代，轉化成上述四種發展模式包含了三項重要的觀點：1.鄉村的不均等發展的類型背後，包含著市場、利益與網絡關係 (地方與地方) 的重新組合，2.不同的鄉村發展模式，代表不同的資源組合與配置，同時也包含不同的商品化過程，3.不同的經濟關係的重組是鑲嵌在不同地方的社會、政治等條件之下。因此這四種的發展類型背後即是不同的地方制度、商品化與網絡關係的重組，而形成再區域化重組地方間的關係網絡。在這區域化的概念之下，區域化不再是一個地理鄰近性的概念，由國家經過區域再到地方進行控制與分工的過程。區域化的討論應由調節 (de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商品化 (Arenas of commoditization) 與網絡與行動者空間 (Networks and actor spaces) 三方面進行討論(Marsden, 1998)。

¹ clientelist countryside 原指侍從主義(clientelism)下的鄉村，其特點為鄉村不足以支持既有發展的維持，必需藉由公、私部門供之生產補貼或就業機會才能維持。在普遍中文學術網路無相應之中文詞彙時，暫以依附的鄉村稱之，並期識者斧正。

第二節 調節理論

調節理論巨觀地處理商品生產代表背後經濟與經濟外體制之均衡。此外，本研究也希望能夠更微觀的檢視農產品的品質是如何的被認識信任。因此，文獻回顧的第三部分將針對品質的治理過程加以討論，這同時也是 Marsden 在商品化的概念中較欠缺的。

調節理論主張，地方的發展與轉型事實上牽涉到地方的制度、傳統、規範…如何與經濟發展與經濟關係配合，再形成一個平衡。Marsden 認為地方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時，地方並不是均質，也並未消失，所以地方才必須轉變以配合發展與轉型。但隨之而起的疑問是，地方的什麼因素或社會條件影響網絡與地方的鑲嵌過程？Murdoch et al., (2000) 指出網絡空間形成的過程中，地方並不是沒有反抗，網絡空間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地去鑲嵌與再鑲嵌的過程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is-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傳統理論在這方面可以適切地回應如何鑲嵌的問題。

在地方與地方形成的集體行動的網絡中，地方內有一套屬於這個地方特有的約定俗成的規範，Storper and Salais (1997) 形容為「傳統就像由相互瞭解與達成共同目的的人們所形成對事物運作的『假設』。當互動不斷地在類似情況下被重覆以及某些行動持續地有效，這些傳統就成為習慣，而我們則不再注意到這些假設要件。」。Storper and Salais (1997) 認為傳統理論成立的前提是任何社會、經濟、政治行動可以在不同參與者之間得以協同進行，他們對這些行動有共識，而這些共識乃源於行動者對結構或社會脈絡有相同的認知。因此，在 Storper and Salais 的概念下，地方的行動者對在地的社會、政治或文化背景或結構有一致的認知，而這些共同的認知決定他們對事物的瞭解與期待，也因此行動者被整合於此習慣

之中 (incorporated in routines) (Storper and Salais, 1997)。Storper (1997) 認為地方傳統包含習以為常的默識知識 (tacit knowledge)，它是長久形成的地方知識，引導行動者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做出最安全的選擇。地方的傳統規範影響人們的行動，在此規範下人們形成一策略性的行動，人們可以依據地方傳統去判斷自己行動的投入與產出，並且藉此期待其他行動者預期行為。因此 Murdoch et al., (2003) 主張傳統造成社會實體上的結構化行動 (an arena of structured action)。

在地方去調節與再調節達成發展與轉型時，傳統理論可以處理鑲嵌的問題。Marsden 的鄉村發展的理論擴充到不同的地方與空間結合，形成集體行動時，它比較著重在地方內部如何轉化 (形成新商品生產，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 然而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卻未能處理不同的地方或空間為何可以形成連結？它們在形成連結時如何在政治、社會或文化等面向上互動配合。Murdoch and Miele (1999) 認為傳統理論可以解釋網絡上不同的組織如何整合其不同的行為規範而形成地方上的一致的習慣。在形成地方間或網絡間具一致性的傳統時，有兩種理論上的可能：其一是某方的傳統凌駕包容一方的傳統，比如說它們之間有著文化或社會的一致性；另一種可能是透過行動者網絡理論所稱的轉譯 (translation) 而發生，此時不同的地方仍舊保有其固有的傳統。

傳統理論反對經濟人 (homo economics) 的理性選擇假說，Lewis et al., (2002) 認為個人在社會中參與集體行動的原則不是「利益極大化」而是尊從社會的制度。特別是當人遇上不確定性時，人會傾向順服既有的傳統。人不可能自外於社會，做出利益極大化的選擇，這不會是他的理性選擇。相反的，人會循著社會既有的規範與傳統，再做出利益極大化的選擇。當商品化發生、空間形成連接時，地方是否接受創新，決定於創新的商品與技術是否能與地方原有的傳統結合。Thevenot et al. (2000，引於 Murdoch et al., 2003) 歸納出 7 種的傳統類別：市場價值，效率，公德，地方價值觀，創意，知名度及環境價值做為鑲嵌之所以發生的原因。這七種傳統代表著行為規範、準則的不同類型，而這七種傳統分別提供七種類型的相關行為或評價去處理人們的日常生活依據。Raikes et al. (2000，引自 Lewis et al., 2002) 也提出四種影響鑲嵌的傳統：市場、人際、企業、公民傳統。市場傳統指物品價值是否符合其價格，而以價格影響人的行為；人際傳統指人際之相互協調以達成集體行動信任是決定協調與否之依據；在企業運作的場域中，

事物循標準程序運作，其行動以固定的準則規範行爲；最後，公民的領域內，公民依其對集體的了解與一般原則行動，而依照公共利益與國家的力量運作。此外也有其他的學者認爲影響社會行動的傳統有品質、生態與國家制度等 (Lewis et al., 2002)。Murdoch et al., (2003) 解釋這些傳統可視爲行動的戲目，提供行動者行動的依據，同時也成爲行動者聯結的一套關係。在空間網絡形成時，這些傳統會成爲一種具有位階關係的關係網絡，而達成網絡上行動的依據。當不同的地方、組織達成集體行動時，地方與行動者不僅根據商品化的需求形成關係網絡，並且它們之間的傳統也結合成一套「行動環境」(environment of action)(Murdoch et al., 2003)，不同的環境會因爲傳統的階層而形成不同的行爲規範，引導行動者的作爲。傳統理論解釋地方間或網絡間形成連結時的作用，它解釋社會或地方如何的微調行動者在跨地方或跨網絡行動時改變行動或價值，以順利的接和兩個差異的地方或網絡。傳統理論視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行動環境，而這些行動環境是地方上不同的傳統所組成，因此當兩個地方形成關係空間或網絡空間時，除了彼此間的調節或治理過程必須協同之外，地方的傳統也會產生互動而影響地方間形成網絡空間的可能。例如兩個農業產地形成關係網絡時，不同的傳統若對於產品的製程的效率傳統或是品質傳統有不同的行動環境，那協同過程中的遠地行動 (action at a distance) 就很可能不會發生，而必須再形成妥協或放棄。

當地方再區域化或分化時，鄉村的地方治理開始轉變，國家的介入，法律或政策對地方的影響開始影響私部門，而有去調節與再調節的發生。國家可能藉由政策去解除對鄉村土地的使用管制與糧食生產，或其他農產品生產的管制。全球化後的農產品自由貿易與流通，不論國家任何的保護政策，都使得鄉村地區的土地使用與生產形成新的調節或治理。這種鄉村調節與地方治理的變化對鄉村地區的影響使得鄉村發展分化至四個主要方向：(1)大宗糧食生產，(2)高品質食品生產，(3)農業相關的發展，與(4)鄉村非農業的發展再結構(Little, 2001)。這種轉向導致出鄉村的新權力關係 (power geometries) (Little, 2001: 98)。因此鄉村再結構的過程中包含國家或地方規劃的轉變，形成新的調節過程。國家在調節過程中的角色，由過去強勢的角色退卻至輔助的資源提供者，或是地方治理中的協調者或管理人的角色。國家的資源減少使得它提供的資源不再能夠影響市場的方向，它僅能提供地方的基礎設施，或是做爲一個信任的基礎，協調、動員地方治理。在英國的例子中，如英格蘭的西部，國家的權力減少，但農民上並未因此增加他們的

影響力，反而是中產階級或非農業的部門影響鄉村發展的方向，而形成了保存鄉村或競爭的鄉村。後生產的鄉村也就成爲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 (a contested social milieu)(Marsden, 1998: 23)。瞭解鄉村發展必需要瞭解鄉村發展的新調節機制與它背後的治理關係。鄉村的調節是由不同的部門共同參與而形成的，不同的鄉村發展，背後都代表不同的部門的治理。Marsden(1998)的調節概念並未忽視地方的差異，否則即不能解釋鄉村發展的差異而形成前述四種發展的理念型。Marsden 認爲地方必須形成自己的調節與制度架構，處理地方發展的優勢與劣勢。因此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中指出地方應有因地制宜的調節差異，由調節所涉及的行動者，互動關係與治理機制去認識地方發展的差異。

鄉村的商品化形成網絡的空間並且引起鄉村內部調節與治理的變化是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在這個理論下，英國的鄉村形成了此種概念上的典型：保存的鄉村；競爭的鄉村、世襲領地與依賴的鄉村。這種類型學與發展理論是否可以應用解釋其他鄉村地區發展，值得更多的關注與需要多元的個案去補充。在理論的層面上，依然有相關的理論可以對此進行補充。

第三節 品質治理

北埔、峨眉極風茶的茶農除了因應福特式的生產方式的改變之外，當地的茶農也提出不同的比賽方式，仿照法國 Appellation system 的評鑑方式，以及建立自有品牌進行網絡交易，此外為建立極風茶的產品分化，這兩個鄉鎮也在 2007 年推動極風茶冬茶比賽，以建立品質標準與促進宣傳。這樣的過程除了是一種地方再調節的過程，回應發展轉型之外，也牽涉到對品質的治理。

Freidberg(2003)指出品質有兩大類型：制度上的品質與交易上的品質，前者為標示或品牌，而後者為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任或規範。Freidberg(2003)認為前者包含於工業化的傳統(industrial convention)，包含標準化的產品及使用程序，以及異地消費與成熟的交通設施等等；而後者則形成家戶間的生產-消費傳統(domestic convention)，通常是人際的信任與產地消費以及非大量生產、非標準化等特色。工業化的傳統較諸家戶的傳統未必是進步的，而不過是調節概念中的均衡的連帶關係。例如在極風茶這種高價與具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中，產地消費可以創造真實性與臨場感，同時具有防偽、教育、品質比較與塑造的功能。Murdoch(2000)補充品質概念另外的面向，他認為除了制度品質(Murdoch 稱之為品牌品質(brand quality))，也包含有生態品質(ecological quality)與消費者感知的品質(consumer-perceived quality)。

此外 Henson (2000) 也指出區分產品品質的面向有三種：產品本身的品質，生產過程的品質與使用者（例如消費者對品牌的主觀評價）方面的品質。這三個面向包含福特主義標準化生產的大宗產品或是非福特主義方式生產的少量地方產品。就農作物生產而言，Henson 的觀點主要在由商品鍊概念下由生產至消費的分工觀點，但農作物的品質通常會指涉到農作物與地方的關係，因此 Parrott et al. (2002) 認為 Henson 的觀點沒有與地方的概念結合。消費者在消費與欣賞農產品的品質時，品質與產地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Murdoch 強調在英國發生狂牛病

之後，消費者對產地的地方性與生態的敏感度增加，因此在分析食品的生產過程中應該更注意農業地區的社會－自然條件 (social-natural conditions)，這是農產品有別於其他商品的最主要特色。福特式的大量標準化生產使農產品在外型、品質上達到一致的標準，看來大小、口味一致。但基本上農產品的生產是有地方性的，地區生長條件的差異，使得同一農產品形成明顯的地方差異。現代農業生產中的侵奪與取代使得傳統農產品在市場中消失，而伴隨著傳統農產品的消失，地方的社會－自然關係也消失了。所以全球化下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方式，使得侵奪與取代的過程在取代地方產品之後也取代了地方。Parrott et al. (2002) 因此稱這種景象為 placeless foodscape。椴風茶傳統的直銷方式意外地成爲一項對抗此類農業現代化的方式，但它的問題是此種行銷方式卻也限制了椴風茶銷售的拓展。

農產品品質的治理過程通常較多在討論真實性與地方連結的問題(Neilson, 2007)。除此之外，等級的判定也是品質治理中重要的一環。Neilson(2007)指出國際咖啡的供應商建構等級與地理認同的目的在於維持他們的利益，而這種品質、等級是社會建構的，反正出供應商的利益與經濟利益。同樣的 Renard(2005)也指出品質不是商品的內涵條件，它必須被建構與行銷以達成集體競爭的優勢。而這也驗證論述影響認識的觀點，例如普洱茶原本的臭曝味經由不同的論述建構，而成爲可接受的陳味。分級與標準也因此成爲私部門常用的手段去增加產品差異化與競爭力的工具(Neilson, 2007)。

Foucault 認爲治理並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行動，而是包含某些意圖的行動。採用治理性的概念理解品質治理的過程，可以更真實的理解治理網絡上行動者的行動與意圖。例如北埔地區治理的意圖就有風味的意圖，產地真實性的意圖，與健康的意圖等。按照 Foucault 的解釋，government 的定義是一個非常寬鬆的概念，「它適用於任何理性、衡量的工作…目的在改變行動。…根據某些規範與目的來改變我們的行爲」(Murdoch, 2004: 41)。在 Foucault 一個處理權力與規訓 (disciplinary) 的概念下，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包含了治理 (governing) 與心態意圖 (modes of thought)。Foucault 的治理性闡釋了權力的行使是一個二元連動的概念。治理不可以被視作一個單獨與靜態的分析對象，治理的背後含有政府與其他參與者的規範性企圖。治理在面對不同的治理網絡連結時，原有的治理企圖會受到挑戰與妥協而達成一個新的規範性企圖，所以任何的治理模式都應被視爲是暫

時性的，同時治理也應該被視為一個動態的發展模式。治理與空間的關係會造成後結構地理學者主張的流動的空間(Fluid space)，其意涵為：空間關係是一個恆常的發展與轉變的關係，而此後結構地理學者也提出一個多元的空間性的概念，反對空間為結構限制，而應超越傳統空間或區域關係。空間的變動、轉變是由規範的空間 (space of prescription) 到協調的空間 (space of negotiation)。Foucault 提出治理的過程不是一個循環論證 (治理改變空間再改變治理)，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在治理的過程中，治理何以能發揮作用去改變空間？是因為治理扮演的角色提供一個行爲的行爲 (conduct of conduct) 的作用。所謂「行爲的行爲」的概念是治理行爲受到一定的意圖所影響，而使得形塑品質的行爲本身是具有意圖性的，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模式。

在品質治理的討論中，治理的發生是一個網絡的概念，研究的課題可以是討論如何改變參與者的網絡以及利用各種行爲去改變治理網絡以及整合治理網絡上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以提高效能。以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概念解釋，治理的發生在於行動者網絡的形成，而產生遠距行動 (action at a distance)。然而 Foucault 的治理性概念適切的補充，行動者網絡的形成是一個協調的過程與協調的空間，在品質決策藉由召喚形成後，各個行動者除非藉由一致同意，對轉譯 (translation) 的成立與接受，否則不會形成具有集體行動的行動者網絡。行動者網絡形成後，各個行動者產生具協同性的遠距行動 (action at a distance)，此行動者網絡才可能達成集體行動的功效。而此遠距行動則為 Foucault 治理性概念的行爲的行爲所造成。Dean(1999)即指出治理性概念包含治理行爲、規範、目標、效果、產出與參與的行動者。此外，它們應發生在行動者網絡上。

第四節 傳統理論

Marsden 認為地方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時，地方並不是均質，也並未消失，所以地方才必須轉變以配合網絡空間的形成與流動。但隨之而起的疑問是，地方的什麼因素或社會條件影響網絡與地方的鑲嵌過程？Murdoch *et al.*,(2000)指出網絡空間形成的過程中，地方並不是沒有反抗，網絡空間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地去鑲嵌與再鑲嵌的過程(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is-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傳統理論在這方面可以適切地回應如何鑲嵌的問題。

在地方與地方形成的集體行動的網絡中，地方內有一套屬於這個地方特有的約定俗成的規範，Storper 與 Salais(1997: 16)形容為「傳統就像由相互瞭解與達成共同目的的人們所形成對事物運作的『假設』。當互動不斷地在類似情況下被重覆以及某些行動持續地有效，這些傳統就成為習慣，而我們則不再注意到這些假設要件。」。Storper 與 Salais(1997:16)認為傳統理論成立的前提是任何社會、經濟、政治行動可以在不同參與者之間得以協同進行，他們對這些行動有共識，而這些共識乃源於行動者對結構或社會脈絡有相同的認知。在形成網絡空間，地方與地方互動時，傳統理論可以處理鑲嵌的問題。Marsden 的鄉村發展的理論擴充到不同的地方與空間結合，形成集體行動時，它比較著重在地方內部如何轉化 (形成新商品生產，形成新的調節與治理)。

Thevenot *et al.*, (2000，引於 Murdoch *et al.*, 2003) 歸納出 7 種的傳統類別：市場價值，效率，公德，地方價值觀，創意，知名度及環境價值做為鑲嵌之所以發生的原因。這七種傳統代表著行為規範、準則的不同類型，而這七種傳統分別提供七種類型的相關行為或評價去處理人們的日常生活依據。

在空間網絡形成時，這些傳統會成為一種具有位階關係的關係網絡，而達成網絡上行動的依據。當不同的地方、組織達成集體行動時，地方與行動者不僅根據商品化的需求形成關係網絡，並且它們之間的傳統也結合成一套「行動環境」(environment of action, Murdoch *et al.*,2003：28)，不同的環境會因為傳統的階

層而形成不同的行為規範，引導行動者的作為。

傳統理論解釋地方間或網絡間形成連結時的作用，它解釋社會或地方如何的微調行動者在跨地方或跨網絡行動時改變行動或價值，以順利的接和兩個差異的地方或網絡。傳統理論視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行動環境，而這些行動環境是地方上不同的傳統所組成，因此當兩個地方形成關係空間或網絡空間時，除了彼此間的調節或治理過程必須協同之外，地方的傳統也會產生互動而影響地方間形成網絡空間的可能。例如兩個農業產地形成關係網絡時，不同的傳統若對於產品的製程的效率傳統或是品質傳統有不同的行動環境，那協同過程中的遠地行動 (action at a distance) 就很可能不會發生，而必須再形成妥協或放棄。

第五節 產區(Terroir)的建立

產區 Terroir 的概念是一個法文中的概念，在其他文化或語言中並無一個如鏡像對應的概念，構成一個法國葡萄酒的特殊品質治理的概念。產區的概念在市場上形成了一個大的地區性品牌或標示，使消費者得以得知某種葡萄酒生產知識的集合，包括品種、土地、氣候、與生產方式等等。這種產區制度的形成除了提供市場商品的知識之外，也具有 Harver 所指出的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性質，因為它指出了產品的獨佔性以及法律上排他的專有性，形成了一個特有的品牌標示。

產區的概念指的是一小塊地方的土壤或微氣候會決定性的影響農產品的品質，（Barham，2003）。通常產區指葡萄酒與獨特土壤的關係。不過在法文的語意裡產區雖然最常應用在葡萄酒的例子，但是它其實是一個一般性的概念，法文中也常說某些風俗或諺語是源自於某些 Terroir（Barham，2003），當然此時產區就不是一個恰當的中譯了。法文中會說某人有明顯某地的地方味或風土性（a sense of the terroir）（ibid.），Terrior 此時也指的是一個人地關係的顯現。

Wilson(1998)把 Terroir 的概念分析整理成一本書：Terroir: The Role of Geology, Climate and Culture in the Marking of Franch Wine 指出產區的構成除了自然條件的

氣候、土壤之外，還有文化的力量。Wilson(1998)認為 Terroir 這個概念在英語世界中是一個不清楚的概念，Terroir 是一個不易掌握的概念。但它包含了葡萄園生長的物理條件：品種、土壤、區位排水與微氣候。除了這些可測量的生態系之外，尚有一個額外的條件：「一個包含歷史上地方的喜悅、心動、光榮、汗水與挫折的精神。」 Wilson 在書中指出的是一個結合自然、文化與社會的 Terroir 形構過程。產區的形成除了有自然、地形、氣候等條件之外，許多地方的耕作方式與人地關係造成了消費者對產區特有的認識，同時廣大的消費者也經過產區的歷史文化論述，將產區形成特有的傳奇。產區的形成同時為科學與藝術。

產區制度的形成包含有歷史與文化等等的因素。產區在產品標示上也扮演一個提供產品資源以利市場運作的功能，否則眾多的消費者在市場上將不知道如何選擇商品，以判定商品的價值。然而產區的另一個意義則是在全球化的現在，保存地方的特色使地方免於消失。當產區形成一個市場上的品質識別時，產區的內涵包含了產品的產地物理、文化與歷史條件。因此當產區識別得以維持時，產區內的傳統製造方式也就會形成市場價值，而得以保存農人與農作物的生活方式。另外一點更重要的因素是產區是一塊有限的小區域，產區的作物生產量也因此無法透過與其他地方的合作來提高產量（如購買原料、加工生產再標示出平地生產的商標）。因此產品與地方的連結將得以保存。產區的農作物受限於自然條件的限制，無法大量增產，而在這種均衡之下，產品與產區的連結使地方得以保存。

在法國的案例中，產區制的歡迎反映出一般人民對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抑鬱（Braham,1997）。而消費者對產區標示的農作物的消費（一般而言，它們較進口的同樣農產品貴）也投射出一種認同與連結的建構心裡。

產區制度的接受除了有上述時代與心理的因素之外，國家提供了一個必要的認證與保護功能。法國的 AOC 原產地標示制度使得 Terroir 產區的實行由一個 19 世紀初即由農民慣行的習俗成為現代國家介入的正式制度。

AOC(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制度為一套由地方提出，經地方與中央審核，核發產品地理標章的正式法律程序，一旦經由審查、協商通過則由中央政府農業部核發產區證明並通行全國與歐盟，其他地區的農產品不得以此地區標示作為宣傳使用。AOC 認證除產品自然條件外，更借重在地文化、歷史與地方連結關係。AOC 的主要認證查驗分三部分：自然條件、人文條件與歷史，其中前二者為重，通過後該項產品則形成一個產品的「原型」與地方緊密結合，使產品鑲嵌在地方的各種生產傳統上，將農產品的一般性結合地方呈現出特殊性。

根據以上的文獻討論，本研究將透過實證的經驗研究，探討生產方式與非經濟的社會關係的互動，以及生產與地方的互動；其次本研究將探討品質治理的行動者與不同的治理意圖（風味的意圖，產地真實性的意圖，與健康的意圖）的關係；另外本研究將研究比賽與品質治理的關係，以及盤商在茶葉治理中扮演的功能。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對策

本研究採用深入訪談、參與觀察以及文獻分析做為研究方法。而量化數據為輔進行研究其安排如下：

- 一、 一級資料的收集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是以半結構的深入訪談以及參與觀察等方法瞭解北埔的傳統與轉型。訪談對象將包含：縣市政府的相關官員、民間組織負責人、地方商家、攤販、居民、遊客及意見領袖，並以深入訪談地方組織的成員，探討其人際網絡的型態與功能。
- 二、 在次級資料的收集文獻回顧與訪談，本研究將收集新竹縣政府與北埔鄉公所的統計數據並實際訪查數據，以及北埔地區的各项產業、人口資料等統計數據，與實際調查遊客與店家數目、消費金額等數字。在理論與文獻回顧的部份，將參考現有的論文、期刊文章等資料，以多方面的資料來源、參考資料交叉比對並輔以「滾雪球」法(snowballing)回溯至其他相關文獻。
- 三、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社會網絡、商品生產、文化與地方傳統對行動者與創新的關係。本研究預備以文獻回顧以及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針對茶葉及

休閒農業等經營者與他們的連結組織(如農會、茶改場、供應商與其它產地茶農)等進行訪談。

第二節 質性研究與個案研究：優點與限制

本研究採用多元的方式或是「三角測量法」(triangulation)的優點是刻意避免研究偏差以及多障礙資料的正確(Taylor and Bogdan, 1984), 因為它可以檢定資料來源的一致性以及不過分依賴單一方法而造成研究的意外中斷

(Denscombe, 1998)。然而這樣的方式對研究人力的需求是巨大的。尤其是該訪談與參與觀察可能會在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導致觀察與操作訪談中人力與器材的較大需求。

質性研究的基本信念是研究對象其背景與脈絡是不可分割的。質性研究不提出普遍以及獨立於脈絡的議題。它必須處理較多的素材以建構一個附著於脈絡上的詮釋。然而, 如同三角測量法一般, 質性研究需要長期與大量的資料, 它對人力的要求是平均的、多量的分佈在研究過程中。質性研究比較無法如同標準化問卷的統計方式可以在短期內僱用較多的人力, 而施以短暫的訪員訓練即可完成量化研究的主要工作: 統計問卷調查。質性研究需要較高素質的協同研究人員以及工作夥伴已達成它的要求。

個案研究通常是質性研究的主要研究策略，在本研究中亦然。它可以提供一個確定的對象以及範圍以探索研究問題。個案研究不在於提供一個普遍性的陳述，它的目的在找出某些特殊的個案，從中提出某種社會關係是可能的以提出理論（Yin, 1994）。他是藉由研究發現而指向理論：某種條件的可能。而量化研究的（假設—驗證）過程則是藉由樣本對母體上的相似而做出數量上的通則化（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一種由少數推廣到多數（前提是少數（樣本）相似於多數（母體））。因為本研究認為地方發展是多元的，沒有任一個地方發展可以代表台灣的社區（樣本之於母體）所以本研究只在提出理論的可能性，但沒有能力指出一種全稱命題的發展模式。

第四章 北埔的地方發展

第一節 前言

北埔的地方發展從清代至今，大體上以農業發展為主，而其較大的轉變以近二十餘年來由農業轉型至觀光業產生較大的轉變。北埔的發展由拓墾到農業產業的地方發展形成一個典型的農村聚落再經過都市化的過程使得北埔形成發展遲滯的現象。在這個過程中，人口外移產業外移，加上交通的封閉，意外使得北埔的聚落形式與鄉村風貌得以保存。八零年代末，隨著台三線與北二高的通車，這些條件反而使得北埔地區的觀光發展有了其他鄉村聚落不及的條件。許多的觀光客至北埔觀光，欣賞完整的聚落形式，田園風光以及純樸的客家文化與美食，這些條件使得北埔的產業由農業轉型至農業與觀光業並存並造成聚落的空間、經濟與社會的變遷。

北埔的開發一直以農業為主，儘管北埔的發展曾經有著一些工礦業的發展，例如：煤礦與樟腦的出口與洋菇加工等，但這些工礦業的開發大致上到 1970 年代前後皆因為生產上失去競爭力而逐漸沒落，農業一直是主要的產業。北埔的地

方發展在這一百多年的開發歷史中一直與鄰近的鄉鎮呈現出一個自給自足的情形，北埔鎮上的商業中心與週邊的村落也維持著一個典型的費孝通筆下的鄉村與鎮的互賴關係，而並非是一個西方都市發展脈絡下的剝削與依附的關係。西方的城市發展過程中都市不僅成爲消費中心並且成爲生產的中心，因此需要向（與）週邊的鄉村地區爭取生產要素中的土地、勞動力與資本而形成一個競爭生產要素的掠奪或剝奪關係。在這樣的過程中都市的發展造成了鄉村地區人口的外流，消費的轉向與市街的沒落，而形成了剝削。北埔的發展過程中鄉與鎮的和諧一直維持到台灣的現代化，鄉村工業化與周邊都市的都市化過程開始而轉型。

北埔的發展轉型主要導因於交通條件的改建以及大的環境因素，諸如：台灣經濟成長後居民對休閒需求的成長，使得這個封閉的客家聚落頓時成爲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就產業變遷而言，北埔的產業轉型可以說很明顯的是由一級產業轉型至三級的觀光、休閒服務業。在學理上，北埔的發展歷程提出了一個有別於羅斯托（Rostow）的線性發展模式，任何地區的發展都有其地方的特殊意義。同時北埔的發展經驗以結構馬克思（Structural Marxism）主義的觀點而言，生產關係與其他的社會制度、文化等構成了解釋社會發展的主要概念：底層結構與上層結構（base and super-structure），所以當生產關係由一級產業轉型爲三級產業時，上層結構中的文化、社會關係等會產生那（哪）些連動式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對地方造成哪些轉變？這些都是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但在本章中，必須先對北埔的歷史發展提出一個基本的介紹以瞭解地方的發展脈絡，同時也對之後的章節提供一個瞭解的認識基礎。

第二節 北埔的歷史發展

北埔的地理環境^{2註1}，以山地及丘陵為主地形由東南之鵝公髻山及五指山往西北緩降，因其受樹狀分布溪流（樹枝狀水系）之深度切割形成（以）北埔、南埔爲中心之三大盆地，再者由於山地與盆地之間落差極大，水流湍急，因而溪谷陡峭深狹無法形成寬廣之沖積平原（如圖 4-1）。

²<北埔鄉概述，：北埔鄉公所，頁 19-20>



圖 4-1 北埔鄉水系圖

資料來源：<http://www.wra02.gov.tw/driver.asp>

由於此盆地（盆底）地勢較平坦且土質肥沃，灌溉水源豐沛，故早在墾隘時期已開發為梯田，此外在盆地周圍之丘陵地形，依地力之不同分別開發為茶園、果園、稻田等多種型態種植…。本鄉因山地及丘陵地形之屏障，未受都會區溫室效應之影響，因此氣溫適中宜人，年平均溫為攝氏 22 度，相對濕度為 79%~80%，降雨量為 1700mm 以上。由於北埔地形成樹（枝）狀結構發展之溪谷系統為主，造成風廊效應（風向不定及風速加大（強、快）等狀況），因此於秋季期間產生由大坪溪谷向外吹之陸風（俗名九降風）。北埔整體而言由於地理環境之關係較少受颱風侵襲所帶來之嚴重風害，惟因颱風所帶來之大量雨水往往使溪流水位暴漲，因而造成大量之水土沖刷，主要的自然災害大抵均在此時期造成。北埔的獨特地理與氣候因素：夏季多雨高溫以及冬季冷涼多風，全年長期吹東北風（吳育臻，2000）使得它生產出最距地方特色的兩項農產品：極風茶與柿餅，前者需要特殊的氣候、地理條件孕育出極風茶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小葉綠蟬，而透過小葉綠蟬的咬食，茶葉才可以生產出特有的甜香與蜜味；另外，柿餅的生產則是本地特有的柿子在採收後經由長期豐富的九降風吹拂，才得以生產出北埔柿餅的獨特風味，為其他地方生產所不能比擬。

在對外的交通方面，北埔過去與峨眉、寶山三鄉合稱大隘。這三個地區為清代「金廣福」墾號，集合客家人、閩南人與官方勢力共同拓墾而成。北埔鄉位於新竹市東南方。北埔鎮上有隘墾的行政中心金廣福公館，也有地方的宗教中心慈天宮，因此北埔在大隘三鄉中成為行政管理的中心以及商業與宗教的中心。北埔過去的對外交通不便，雖然北埔有著少數的工、礦產業使得北埔與外界有著必要的交通與社會連結關係，但就一般的日常生活而言，傳統上居民的日常生活仍侷限在大隘三鄉之內，以北埔為地方之行政、消費與宗教中心。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地理學中的區位與土地利用的理論大致上均能夠解釋北埔在大隘三鄉中的核心地位。

大約在 1960 年之前，新古典的經濟地理理論：邱念圖（von Thunen's model, 1826）；工業地理（區位）論（Weber's model, 1909）與克里斯特勒的中地理論（Christaller's Central Place Theory, 1933）都尚能解釋現實世界之中的土地使用與區位分布的關聯（Healey and Ilbery, 1970），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中，Healey and Ilbery 指出這三種新古典理論很快就失去了對現實世界的解釋了。這些新古典經濟地理之所以無力再解釋現實社會的土地使用與空間區位類型乃是因為它們對人的行為與決策解釋前提已失去了效力。在傳統的農工社會，個人或廠商的決策前提大概服從於以下幾項理論前提（Healey and Ilbery, 1990）：①完全知識（perfect knowledge），②理性的經濟行為，③利益極大化原則，④距離與運輸成本的線性變化關聯，與⑤同質（平坦、寬廣）的物（地）理環境。如果服從這五項理論前提，那決定土地使用類型與空間類型的惟一關鍵要素即為「距離」。因此在邱念圖理論中農作物的空間分部由經濟租（economic rent）所決定，而經濟租則由距離與運輸成本所決定；韋伯的工業地理也是以運輸成本來決定，工廠的設立地點接近原料產地或是市場；在服務業方面，克里斯多（徒）勒的中地理論亦以交通成本與距離因素來討論服務業或行政中心設立與分佈的準則。

對於新古典經濟地理的批評有許多，除了前述的理論前提不適用之外，Healey and Ilbery (1990) 也指出這些理論對於社會變遷缺乏解釋能力，以及忽略發展與區住關係中的歷史因素與產業本身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因素。此外，工業地理學者 Massey (1984) 發現社會因素被忽視而認為經濟發展不應被孤立地視

作理性人的成本效益決策。Massey (1984) 指出沒有空間過程這回事，只有社會過程與關係影響空間形式。然而，在北埔的變遷與發展歷程中，北埔與大隘地區的開發一直相當服膺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地理理論，而這個狀況一直到光復後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快速發生，以及 80 年代末迄今，台三線、北二高與東西向快速道路的逐漸通車使得時空壓縮 (time-space compression) 的影響，將北埔地區納入到北部都會圈之後方始有轉變。

吳育臻 (2000) 指出，北埔在開墾之初，即成為市場所在。根據吳育臻 (2000:95) 的調查，北埔等大隘地區有著明顯的中地等級不同的分佈，北埔埔尾為一級中地，峨眉為二級中地，雙溪為第三級，而峨眉鄉的甯興與寶山鄉的新城同列為第四級。但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台三線等主要交通幹道通車後，此一封閉的聚落體系被擴大至竹東，甚至新竹之後，大隘地區的日常生活消費已有轉移的現象。這個現象說明了新古典經濟地理的理論，特別是中地理論並無法說明社會變遷對於中地的移動與消長的影響。此外，交通的便利與交通工具的普及與提升也擴大了日常生活的尺度 (scale) 而使得原先北埔與周邊地區的中地關係必須隨之調整。根據作者的調查，北埔地區的居民已有日常消費的移轉至新竹地區的大賣場採購廉價日用品的現象，較之吳育臻的調查，購物圈已在近年來由竹東、頭份、新竹擴大至新竹與竹北等地。

第三節 北埔歷史發展與聚落變遷

北埔的開發自清道光年間開始，由於新竹地區已無多餘之土地可供開發，僅東南山區仍有當時漢人尚未管轄之土地，因此由當時淡水同知推派地方人士組成「金廣福墾號」。「金」代表吉兆，而「廣」、「福」則表示出資創立者為粵籍與閩籍人士 (吳學明，2000)。當時大隘地區的原住民為泰雅族與賽夏族人，北埔的開發史實際上也是原住民土地的流失史，但北埔的地方歷史中幾乎未有由原住民觀點的紀錄，也鮮有記載原住民居住或生活遺跡的文史記錄，僅有口耳相傳見原住民老婦至鎮上廟前街與公園街間之古井流連之傳說，衡諸北埔開發於道光 15 年 (1835) 迄今已 170 年，此說似乎僅有傳奇之色彩。

北埔地區初期的開發以土地掠奪為主，隘丁墾民由原住民手中取得土地開墾

耕作，之後進入大隘地區深層內山開發，有學者認為係因休養生息足夠，於是促成再度開發（吳學明，2000），也有學者認為是由於領導人的謀利與個人特質所促成（莊英章，引於吳育臻，2000），或是由於入山獲取樟腦利益而使得這樣的拓墾開發持續的發生（吳育臻，2000）。不過，事實上這三種說法並沒有衝突並且可以同時成立。歷史學者或許在探討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分期分段的解釋，但由地理空間的角度看來，在清代的這段拓墾的過程中是由於資本累積的需求，使得累積資本的唯一方法是在取得更多的土地，取得生產的原料、樟腦。同時，也因為邊界的推進，也使得人口移入，形成包含集村與散村的聚落形式。

北埔與大隘地區的開發於清代已大致底定，在日據時代的開發就人口與土地而言，並無明顯的增加，相對於全台灣的人口增加率，「本區（大隘地區）的人口自然增加已被社會增加所抵銷，由於台灣日治以來的人口成長，可視為一個封閉性的人口成長...，因此，比較本區和台灣地區的人口增加率，結果顯現：自大正九年（1920）起，本區顯然已是人口流出區。（吳育臻，2000）」吳育臻指出人口遷出的主要原因為：①交通發達的結果；②都市化的結果（吳育臻，2000）。而至戰後，北埔等地區由於台灣工業化的發展，農村的勞動力根據外流至都市為工業勞動力提供廉價而充分的勞工。根據陳國川（1988）的調查，北埔地區的人口在民國 60 年即開始持續的減少。而此一現象一直持續至今。根據北埔地區最近的調查（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2004）；北埔的人口數為 10525 人（2003），而同時間新竹縣的人口數仍有 1.46% 的成長率，並且外流人口的質量為青壯人口，北埔地區的人口結構已呈現兩極化的現象。根據民國 91 年的新竹統計資料（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2004）北埔鄉的扶幼與扶老比分別為 23.98% 與 32.24%，平均每位成年人要扶養 0.56 位的老幼人員，負擔不可謂不重。

北埔聚落的開發史簡要的說為一土地的農業開發過程，而這個過程大約是興盛於清代的開發階段，到日據時期的 1920 年代已達頂峰。這段期間的生產要素配置是由豐沛的勞動力，爭取土地資源的農業開發方式，至 1920 年之後因為都市化與交通條件的改善，人口開始出現外移的現象。在國民政府遷台後，人口外移的現象因為台灣的工業化過程與「農業扶植工業」的政策使得鄉村人口外移與鄉村人口極化的現象成為發展的限制。

第四節 北埔的現況與發展願景

北埔鄉位於新竹市東南方，由圖 4-2 中可看出鄰近鄉鎮有峨眉、竹東，行政區劃分為九個村，全鄉共五十六平方公里。除少數的外地生意人，主要的居民為世居於此的客家人，多數人口集中於二十六公里的環山小盆地上，六成的人口又集中在北埔、埔尾與南埔三村(台大城鄉基金會，1996)。北埔的發展在原住民之後、客家文化已有約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由於地處丘陵交通不便，今日仍保有相當完整的傳統文化地景與客家文化。



圖 4-2 北埔鄉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1.hchg.gov.tw/xx/township/township.asp>

北埔是由隘墾發展成的農村聚落，交通不便，使得在空間上擁有一級古蹟金廣福公館與天水堂、三級古蹟慈天宮、傳統民居以及田園景觀、大坪冷泉、五指山宗教聖地等自然與文化資源。在產業部分早先為木材、茶葉與煤礦的產地；現今主要的產業仍舊為農業，服務業次之。北埔地方多為山坡地，可耕水田有限，農業多以茶葉與水稻為主。物產方面較為人知者為膨風茶、柿餅等。

北埔地區的發展現況屬於發展遲緩與人口外流之區域而產業的部份仍是以農業為主。根據新竹縣統計要覽如圖 4-3，從民國 85 年至 97 年北埔人口成長率均為負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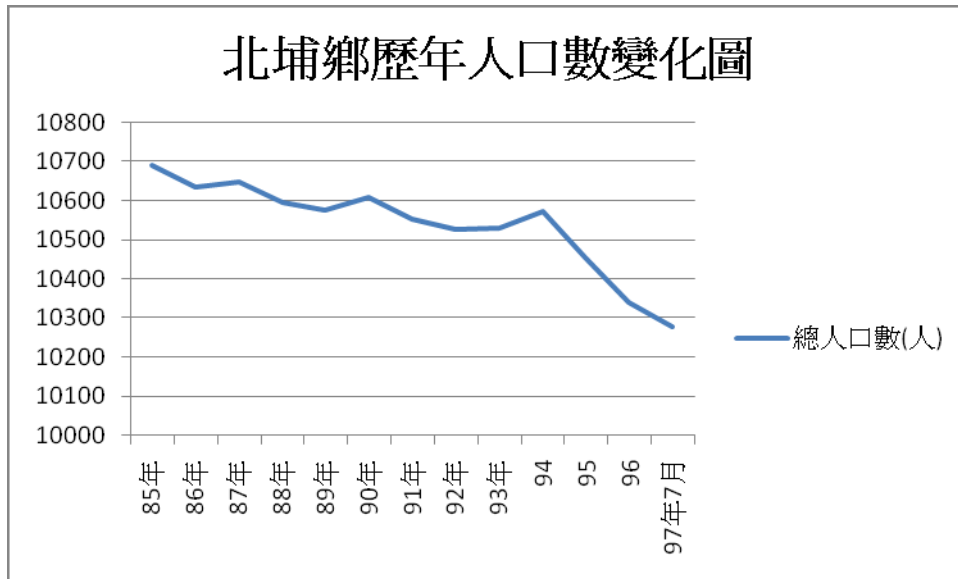


圖 4-3 北埔鄉歷年人口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新竹縣統計要覽

但另一方面人口戶數卻為增加的趨勢，顯示家庭結構朝向小家庭，如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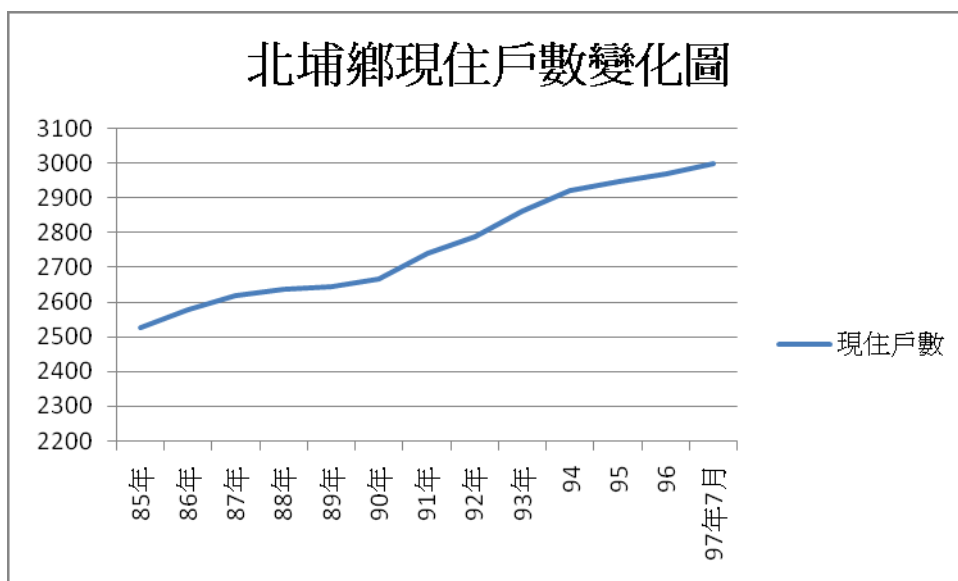


圖 4-4 北埔鄉現住戶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新竹縣統計要覽

這樣的趨勢可以預測對住宅的需求可能增加，不過扣除三代同堂的抵消作用，仍須進一步的資料加以驗證。在實際的田野訪查中，北埔當地未有提供大量

就業機會的工廠，加上交通的便利，在當地的青壯人口有許多均在北埔之外的竹東、新竹或科學園區工作，但這些在外地工作的人力並未加以形成西方鄉村中的有業兼業農（Worker-peasants）。

兼業農的出現是西方鄉村社會中城鄉推、拉力作用下的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在之前所述的北埔拓墾過程中，生產要素的配置一直是停留在傳統的土地、勞動力與資本三項上。而早期的北埔地方開發是多餘的勞動力以開墾與驅逐原住民的方式來爭取土地上以利發展。但是到都市化與鄉村工業化的階段，或是台灣的農業扶植工業階段，則是工業發展追求勞動力的現象。由北埔的人口結構變遷來看，多數移出的青壯人口是直接以遷移的方式至都市工作，而未形成西方城鄉發展中的勞動力現象：兼農業（I）（Worker-peasants）。在西方的經驗中，兼農業（I）的生活形態是以城市工作為主的工人，利用工作之餘從事農業。在 1960 年代，西德有 1/4 的農人是這樣的兼農業；波蘭則現有 1/3 的農人屬於此類農民（Hornby and Jones，2000）。以北埔與鄰近地區的吸、拉力作用對人口遷移與西方經驗比較而言，為什麼北埔地區並沒有發展出此種兼農業，進而造成對聚落形態與地景的影響？Hornby 與 Tones（2000）的一段美國鄉村的描述可以做為註解：「在美國距城市不遠的農業區裡，常會見到在交通要道旁，有著停滿車的停車場。通常是農民開車至此在共同搭車去城市工作，這是兼農業上、下班換乘車的場景。」交通條件（包含道路與公共運輸系統）是美國的鄉村地景變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它同時使得鄉村農民可以至城市工作，並且吸引城市居民至鄉村置產成為週末來度假的都市居民。簡言之，交通的便利同時擴大了都市與鄉村的尺度成為一個相連而交流的體系。在 Hornby 與 Tones（2000）描述的美國聚落發展經驗中，兼業農的兩地工作通常會進一步導致鄉村社區分解，因為這些兼業農的都市經驗常使得他們對鄉村社區的日常生活方式與地區產生不滿，久而久之部份的農民便會遷移至都市生活。至於遷移後的居民，則成為都市人的鄉村渡假居所。在西方社會中，1970 年代便有各三百萬的這種第二個家（the second home）的鄉村居所在西歐與美國出現。同樣的，在加拿大約有 50 萬戶，而澳大利亞則約有 25 萬戶。這種由工作帶來的遷移乃至鄉村的再結構造成質與量的變化，是緣起於都市與鄉村兩個生活體系的連結，而交通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在西方的城鄉發展的經驗中，藉由交通的改善造成的人口流動：兼業農的形

成與遷移，都市中產階級在鄉村地區置產等現象導致城市周邊鄉村地區郊區化（suburbanization）的形成。在鄉村地區會形成一個二元的社會組織：鄉村原住民與新移入者，而導致鄉村社會的解構與重構，因為鄉村地區二元的世居者與新移入者通常是不相來往的。北埔的發展經驗顯然與西方社會的城鄉互動經驗有很大的差異。如之前的人口資料顯示北埔的人口數為負成長而此等郊區外的過程並未明顯發生，雖然近年來確有新竹地區的外籍人口遷入等是在數量上僅有零星的發生。在房地產方面，北埔近年來的新成屋僅有 81 間，佔全部住宅的 3.2% 且大多均為三樓以下的建築。郊區化並非是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上述的都市郊區化的經驗在台北市的郊區新店與汐止，或是台北市對宜蘭的影響上均明顯的發生。北埔經驗的特別之處有以下二點：第一、北埔的人口不斷地外流，但在外流過程上跳過了通勤與兼業農這一階段的緩衝，第二、北埔在近年來仍然有著明顯的社會變遷，而這個變遷過程並不是由都市人口侵入所造成，而是由其觀光轉型所造成。

北埔的人口移動過程驗證了城市對鄉村的吸力作用大於鄉村本身的拉力，但另一方面鄉村的田園景色與淳厚的民風並未吸引城市的居民移居到鄉村居住而形成人口的對流，造成鄉村居民人口素質的改變。這個因素有二種可能的原因。其一是台灣的居住習慣是中、上階層仍習慣居住在都市中心，因為都市的公共設施較為進步。

第五章 台灣茶產業發展

臺灣的茶產業生產可以追溯至 19 世紀，早期一直以北部的為主，生產紅茶、綠茶、烏龍茶、包種茶等茶葉，外銷至歐洲、美國、日本與北非等地。北部地區

由 19 世紀到 1970 年代，一直都是臺灣茶葉生產的重心，早期北部茶園的生產方式是茶農負責生產茶葉的原料，而大型茶廠則負責加工茶菁，再由貿易商或盤商出口，形成一種福特主義式的生產方式(fordist mode of production)，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則是成立技術研發與推廣的單位與茶葉生產秩序的管制，而形成早期的茶業分工與治理的過程。林木連等（2003）指出栽培試驗場的設立配合機械製茶的發展，是台灣有事業茶葉研發單位設立，台茶全面走向機械化生產的濫觴。在日據時代，日本政府為因應台茶外銷則大力提倡機械化的生產，使台茶的生產結構形成為茶農生產茶菁，茶廠加工的分工模式。

1864 年英商 John Dodd 在淡水創設寶順洋行。1866 年他以借貸予農民的方式鼓勵現今臺北文山與桃園大溪等地的農民大量種植茶葉外銷（林木連等，2003）。1869 年，臺灣所產之烏龍茶外銷紐約，外商來臺收購茶葉，茶價暴漲，許多的土地開始轉作茶業。在 1865 年至 1972 年的 7 年間，茶葉的生產由 8,222 公斤增加至 1,170,811 公斤，當時的出口主要為洋商所壟斷。至 1892 年，華商在生產技術與規模上已與洋商不相上下，本地資本與大陸的資本，聯手地改變了產業的行銷結構（林木連等，2003）。當時（1889）已出現類似現在同業公會的茶郊組織約束與規範茶商的商業行為，建構或維繫市場與生產的秩序。林木連等（2003）指出當時茶郊規約的內容有：(1) 控制商譽，禁止與制裁茶葉混摻的情形；(2) 解決茶事糾紛；(3) 收取規費，對於茶工與茶葉收購者提供救濟措施。茶郊與傳統的郊組織比較上特殊之處在於它不僅有協調、仲裁與保證等功能外，它形成一個地方性的商業團體，為品質提出把關與保證，提供制度性的信任關係。當時郊商的主要做法是透過罰金、沒入、調理與送官法辦等方式來約束成員。從茶郊的規約中得知清末臺灣的茶葉生產，政府並未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是市場的力量在影響茶葉的生產。除了郊商的調節作用之外，清末茶葉的生產過程中也出現了一個特殊的角色：買辦資本或媽振館（Merchant 之譯音，邱念渠，2005）。根據邱念渠（2005）的研究，媽振館同時接受本地茶行與洋商的委託，促進交易的發生。一方面，它接受茶行的委託代銷茶葉給洋行，「收貨後付款八成，然後將產品運方廈門總館暫存，待茶價高時賣給洋行…」；另一方面，它也接受洋行的委託代購茶葉，將洋行預付的資金轉貸給生產者。這種制度的出現使市場的不確定性降低，同時提供資金的信用保證。

到了日本殖民時代，茶葉的生產邁向企業化的經營，日本政府成立茶樹的研究單位分別在臺北文山、桃園草湍坡庄等地成立「茶樹栽培試驗廠」。在龍潭成立「栽培試驗廠」，「…以配合機械製茶的發展，這是臺灣有專業茶葉研發機構與臺茶全面走向機械化生產的濫觴」(林木連等，2003)。成立茶葉的研發單位之後，日本政府更以免費推廣茶苗的方式更新茶園並以資金借貸的方式推動茶葉生產的機械化(林木連等，2003)。在日本政府的銳意經營下，1917年臺茶的年產量已達17,160,000公斤，較1895年的10,200,000公斤成長了71.6%(邱念渠，2005)。日本政府提倡的機械化製茶與臺茶的外銷為主的生產模式，使得生產結構也發生轉型。大型製茶廠成立，小規模的茶場與農戶因價格與品質不具競爭力，使得一般的茶農轉向生產茶菁，販售予大型茶廠。因此生產與製造在此時形成了專業的分工，而北台灣的桃園廳，在當時有19,058.58甲的生產面積，佔全臺之冠。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時，臺灣的茶園多數因戰爭導致荒蕪，總產量僅剩1,430公噸，不及1917年的十分之一。國家強力介入茶葉的生產，首先於1950年訂定「臺灣省製茶業管理規則」，業者必須向主管單位申請設廠許可，申請合格核發「製茶工廠許可證」方得營業。根據1951-1952年的統計，當時全臺有300家合格茶廠，其分佈為臺北市50家；臺北縣60家；桃園縣60家；新竹縣100家；苗栗縣25家；其他縣市共5家左右，全台300家合格的茶廠，台北縣市與桃、竹、苗地區共有295家(謝明妃，2002)。(謝明妃，2002)。使得台灣茶葉的生產秩序一直維持在機械化大量生產、標準化生產的福特主義式的治理狀態。管制的結果使茶菁市場的交易受到限制，茶農必須將採得的茶菁交予合格的製造廠製造。製茶廠申請許可證，再加入製茶工業同業公會，接受工會的督導。政府對茶葉的管制還包括了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對外銷茶類訂定出口底價，這一連串措施使得小農生產，茶廠製造的生產秩序形成一道嚴密的網絡。1973年，經濟部增訂了「製茶工廠最低設場規則」將茶葉納入食品加工的管理規範，更提高了製茶業的門檻，保護現有的茶廠免於受到新加入者的挑戰(邱念渠，2005)。

隨著台灣轉向工業發展，政府逐漸廢止相關的茶業生產調節措施，而台灣的茶業外銷市場也在 70 年代逐漸下滑。林木連等（2003）指出，1974 至 1984 年間是台灣的茶葉由外銷轉向內銷的關鍵時期。1980 年開始，台灣進口的茶葉量超越了出口量，1997 年政府首次動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輔導茶農轉作及生產補貼，原因為桃竹苗等地生產的外銷茶及飲料加工的原料茶不斷累積使庫存量大增所致（林木連等，2003）。

臺灣的茶葉生產在 1980 年代之前均集中在北部丘陵區，主要以外銷為主（林滿紅，1999）。一方面有政府對製茶廠的管制，提高進入的門檻；另一方面則是農業政策中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以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得農民取得土地生產茶葉。小農增加，販售茶菁與製茶廠生產再投入國外市場是當時北部茶區的主要生產模式。1982 年，政府廢除「製茶管理規則」。1987 年廢止「製茶工廠最低設廠規則」，此後茶農無須加入公會，也不需要執照即可買賣茶菁與生產茶葉（謝明妃，2002）。農民覺得自己投入茶葉的生產與販售茶葉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於是投入茶葉的生產，使得大型的茶廠不易收到茶菁，難以維持。

另一方面，臺茶在外銷市場的銷售量在 1973 年達到高峰之後開始下滑，而這也使臺灣北部以外銷為主的茶葉生產有了結構性的轉變。依據林木連等（2003）指出，1974 至 1984 年間，是臺灣茶葉由外銷轉為內銷的關鍵期。首先是政府在 1964 年取消茶葉外銷底價制度，偽劣的的臺茶開始出現在國際市場，使得茶葉的信譽開始下跌（邱念渠，2005）；其次是臺灣的生產成本增高，降低了茶葉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林木連等，2003），特別是茶葉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成本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因此工資的上漲會大量地反映在茶葉的價格之上；第三，臺灣的內銷市場在 1980 年代之後開始興盛，迅速的襲奪了外銷的市場（徐起欽，1997；林滿紅，1997；林木連等，2003）。依據陳宇翔（2005）的研究，在 1979 年時凍頂烏龍茶每臺斤 1,000 元，折合美金 44 美元/公斤；文山包種茶 600 元，折合每公斤 37 美元；印度，錫蘭，肯亞的高級紅茶在國際市場為每公斤 3.2 美元，而當時國內普遍的內銷茶價為每臺斤 320 元，折合為 12 美元/公斤³。價格差異使得國內的茶葉由外銷轉向至內銷市場。茶葉在外銷轉向內銷後，原本北部丘陵地生產的紅茶、綠茶產地開始沒落。1980 年開始，臺灣進口的茶葉量開始超越出口量。而

1995 年起國內的製茶廠拒絕收購國產茶菁，1997 年政府首次動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輔導茶農轉作及生產補貼 (林木連等，2003)，其原因為桃竹苗等地生產的外銷及飲料加工原料茶不斷累積使茶廠庫存量大增所致。臺灣北部丘陵地區的茶葉隨著外銷的沒落，而中南部烏龍茶與高山茶則適時而起，生產出適合本地口味的茶葉。

臺灣茶葉的生產在 1900 年至 1980 年代，主要在北部，而中部僅南投種植阿薩姆紅茶 (陳宇翔，2005)。在臺茶外銷沒落轉向內銷後，呈現出兩個趨勢：北盛中衰與海拔上升 (陳宇翔，2005)。桃園縣與新竹縣的茶葉生產面積均由 60 年代的 9,945 與 12,811 公頃下降至 2003 年的 1,184 與 1,199 公頃，僅剩餘最高時期的一成 (陳宇翔，2005)。台灣的茶葉產區的空間再結構過程並不僅是空間頂替的過程，它們是不同的生產方式與產品生產過程的消長，而不是相同生產方式的水平移動。北部茶區與中部茶區互為不同的生產區域，包含地方、品種與治理方式的差異。過去外銷茶區的北部茶區以生產紅茶、綠茶、包種茶為主，以大規模的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取得價格優勢以利出口，生產結構為小農與大廠的合作。

茶區的消長原因在於外銷市場的沒落與市場口味的轉變，但這兩個地區：北部與中南部的茶區之間，並沒有轉換的關係 (由海外市場轉向國內市場) (陳宇翔，2005)。這兩個茶區為不同的區域概念，它們的市場、生產策略與產品儘管均為茶葉，但卻有本質的差異。過去以外銷為主的北部茶區以生產紅茶、綠茶為主，以大規模的福特主義方式取得價格優勢以利出口，而其產業分工則以小農生產茶菁，販售與製茶廠的生產結構為主；而臺灣在 80 年代以後，中南部興起的烏龍茶則是以生產烏龍茶、高山茶為主，它們的生產則是由小型的生產、製作二元化的小廠，生產出符合本地口味，具差異性的茶葉為主，甚至臺灣發展出特有的「高山氣」與「山頭氣」的論述以形塑地方性的「品質」概念 (陳宇翔，2005)。

臺灣茶葉的生產在歷經由外銷轉向內銷與主要產區南移之後，政府對茶葉生產的作法也因為農業重要性降低，而由積極的管制轉向為消極的輔導。在早期 1950 年代左右，每年茶葉的外匯收入佔全國外匯的一成左右 (許漢卿，1992)，

國家對臺茶的外銷有許多的管制措施，從生產到製造到外銷的報價等都有強力的管制，但隨著 1987 年廢除「製茶工廠」最低設廠規則，解除了對茶葉生產的管制，政府對茶葉的生產已沒有積極性的介入與管制，因此北部茶區有許多已轉為高爾夫球場或工業區。此外政府對於進入 WTO 之後的市場開放，導致的中低價使茶葉所面對的市場劣勢與高山茶園造成的社會成本也都未能有效因應⁴。

第六章 槿風茶對地方的發展與影響

北部的茶區因為政府的政策而形成路徑依賴，在台灣逐漸工業化之後因為工

資上漲與外銷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形成轉型的壓力。茶為一主觀的飲品，它的口味一旦為市場決定之後，不易再做調整。當北部茶區在外銷市場失利時，所面對的是不易調整的消費者偏好。形成這些偏好的原因很複雜，有樹種、地形、氣候等自然環境，有地方形成的生產知識與產銷體系，以及茶文化中的論述，如「高山氣」與「山頭氣」等等。這些因素都使得北部茶區不易超越中部新興的茶業商品。

然而，約在 1980 年代後期，竹苗等地傳統的槎風茶成為北埔與峨眉兩鄉鎮茶葉生產的主力。槎風茶的平均價格，不但較之前北埔、峨眉原生產的綠茶、包種茶為高，而且較目前盛行的高山茶亦不遑多讓。目前新竹縣的槎風茶，頭等的價格約有 32000 元至 36000 元一斤的身價。若未得獎的茶葉也平均有近 2000 一斤的價格，不低於高山茶的價格。槎風茶特別之處在於它必須以端午節前後，為小綠葉蟬咬噬的茶葉才可以製造，同時它不可以用機械化的方式大量生產，必須以人工的方式，以肉眼挑選被小綠葉蟬咬噬的茶葉，再以手工摘採，因此產量相當有限。這些生物、地理、氣候以及特有的默識知識（tacit knowledge）共同造就槎風茶珍貴之處。根據日本學者小林彰夫 1996 年的研究，槎風茶的獨特香氣來源可能來自茶葉中較高的 2,6 二甲基，3,7 辛二烯，2,6 二醇等化學物質（蔡永生等，2005）。

北埔早年是臺灣外銷茶的主要產區。生產槎風茶有地方的獨特性，在樹種、文化等特色都有利於轉型的發生，它與臺灣目前主流的茶葉有明顯區隔，而其價格更是臺灣茶種中平均單價最高者，與高山茶相較起不遑多讓。本文以 Marsden (1998) 的鄉村發展理論，說明鄉村發展發生的過程是一個商品轉換與再生產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地方的治理與調節機制扮演重要的機制。地方轉變商品的生產，商品也轉換地方與地方間的關係，使得鄉村的發展形成空間關係的改變與再連結。

新竹縣在 1960 年曾為臺灣主要的茶葉產區，而其生產之紅茶、綠茶供外銷為主。新竹縣的茶產業與桃源仙非常類似，日人在桃竹苗地區推廣茶葉生產，提倡機械化生產，因此這些地方的茶種均為清新大冇。早期日本在臺灣的茶葉是以

外銷爲主。滿清統治時期，臺灣只有生產烏龍茶與包種茶 (范德光，2004)，但日人據臺時期爲避免本國的茶葉外銷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受到臺灣輸出之烏龍茶的排擠，因此鼓勵新茶區生產紅茶與包種茶 (邱念渠，2005)。根據龍潭地區的茶農指出，龍潭早期以生產紅茶爲主，主要外銷歐洲。邱念渠 (2005) 指出，日治時期紅茶外銷的高峰出現在 1937 年至 1940 年間，紅茶的輸出量在 500 萬公斤左右，在 1915 年時桃園廳爲全臺最大的茶葉產區，計有 1,9058.58 甲，而當時的南投不過 442.04 甲 (邱念渠，2005)。二戰後，大陸的炒菁綠茶引進臺灣，開始有炒菁綠茶外銷北非，隨後又有日本的蒸菁綠茶生產方式引進臺灣。台灣北部當時兼有紅茶、綠茶的生產。臺灣茶業的外銷在 1973 達到歷史的最高峰，計有 23,500 公噸之多，其中外銷日本的煎茶有 2,000 公噸；銷非洲炒菁綠茶 5,000 公噸；烏龍茶與包種茶外銷 3,000 公噸，紅茶則有 1,900 公噸 (范德光，2004)。臺灣茶葉外銷在 1970 年初達到高峰，接著外銷數量銳減，由外銷轉向內銷市場，主要因爲國際間其他國家投入茶葉市場，以及國內的工資上漲，導致商品缺乏競爭力。另外，日人的口味轉變，也導致銷日煎茶的數量銳減 (范德光，2004)。在 70 年代臺灣茶葉外銷的黃金時期之前，臺灣每年外銷茶葉數量都在一萬五千到兩萬三千公噸之間，茶葉外銷賺取的外匯有三千一百萬美元之多 (謝明妃，2002)。這樣的數據也與龍潭地區的茶葉發展高峰相符，說明了台灣北部地區的茶業發展主要是受到外銷市場所影響，當臺灣茶葉外銷達到頂峰轉趨下滑，台灣北部地區的茶葉產地面積與產量也在此時隨之轉變。

槿風茶對新竹地區的茶產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竹縣 2007 年的槿風茶比賽共有 1500 點 (每點 10 斤)，而這些僅爲比賽茶的部分。它爲地方的茶農與地方的農業提供了極大的收益。同時，因爲槿風茶爲夏茶，而一般台灣的茶業在夏天不生產。夏天的茶葉味道較爲苦澀，多數是以低廉的價格販售予飲料茶廠成爲原料，或是剪枝棄置後，待秋天的秋茶摘採。槿風茶的生產特性使得它爲其他茶產區接受，成爲提高茶區產值的良方。目前除了新竹縣外，台北縣、桃園縣、苗栗縣與南投縣等地都在推廣槿風茶的生產。同時，槿風茶特有的氣味與香氣使得外來的低價茶不易模仿，成爲學者稱之的防禦的地方主義 (defensive localism) (Goodman, 2003)。

槿風茶的特性具有特有的地方性以及生產的默識知識，使得槿風茶在其他地區生產產生了品質的變化。龍潭卻在 90 年代開始引進槿風茶。譚鴻仁（2007）指出，龍潭由過去福特主義式的生產方式轉向生產槿風茶，而與新竹的產區形成一個由生產關係為基礎的關係空間，其方式有包茶制與自行生產兩種。這兩種的生產方式之後代表著是兩種經濟生產關係的比較與競爭，引起社會關係、社會秩序及傳統的改變。此經濟關係的改變事實上帶動了關係空間內的傳統的變遷。另一方面，關係空間的結合與變化會帶動農產品生產背後的社會與環境、地景的改變而形成一個二元的關係空間（譚鴻仁，2007）。以槿風茶的生產為例，槿風茶的生產除了牽涉到茶葉的品種以及地方的知識傳統之外，它尚包含地方的勞動力供給（如爛熟的勞動力，但卻只有季節性的需求）、地方的產銷系統（槿風茶普遍以人際網絡為銷售管道，缺乏盤商存在的空間）、評價與品質的傳統，以及特有茶園管理方式（槿風茶需要小綠葉蟬的叮咬，所以在春、夏季時不可施藥）。這些因素使得槿風茶在結合新竹與外地時，形成地方與地方的生產協同關係以及地方與農產品的產品地方關係（ibid.）。

槿風茶帶動的生產方式的改變引發一個福特式生產方式與後福特生產方式的衝突，因此龍潭的茶農才會選擇繼續維持標準化大量生產的方式保持其春、冬茶的生產，而以販賣茶菁的方式降低生產方式的衝突；另外的茶農則克服生產方式的衝突，選擇自行生產槿風茶，以獲得更高的利益。在龍潭與新竹形成關係空間的個案中(ibid.)，並未探討這種由規範空間(space of prescription)到妥協空間(space of negotiation) (Murdoch, 2006) 的動力。Marsden(1992)就指出福特式生產方式的退卻，會造成市場與消費過程的變化，而引起資本流動、勞工與消費者的改變。

新竹縣北埔、峨眉等槿風茶區目前在由槿風茶引導的生產關係改變與關係空間形成的過程中是採取何種的發展策略？目前的趨勢大致上是空間上形成關係空間，而在時間上則出現春茶與冬茶轉向生產槿風茶的現象。所以是逐步轉向一個替代性農糧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 AAFNs)的操作方式發展。替代性

農糧網絡有別於傳統的機械化、標準化、大量生產與消費的生產模式，強調以地方為基礎(place-based)與社會鑲嵌(socially embedded)的農業操作(goodman,2003)。

目前北埔、峨眉的發展策略是扮演槿風茶品質的制定者，而其他地區不是追隨它所制定的品質(味道、香氣、湯色等)，如龍潭；即是避開它的品質，自行設定標準，如南投，建構出一個更多元、異質的茶品系。在槿風茶成爲一個 AAFNs 時，它的發展過程如同 Sauer(1990)指出，應當關注於福特主義如何更動轉型中的生產關係外的社會關係。Marsden(1992)也指出福特主義是生產的退卻會引發新的生產、市場與消費的轉變。北埔、峨眉的槿風茶，除了藉由關係空間的形成帶動其他地方的變化之外(譚鴻仁，2007)，這兩年這兩個鄉鎮也在推動春冬季生產蜜香系列的茶系，進而影響春、冬茶的生產消費的經濟與社會關係。此外爲進一步制定品質與價格，這兩個地方也推出正式的(槿風茶)冬茶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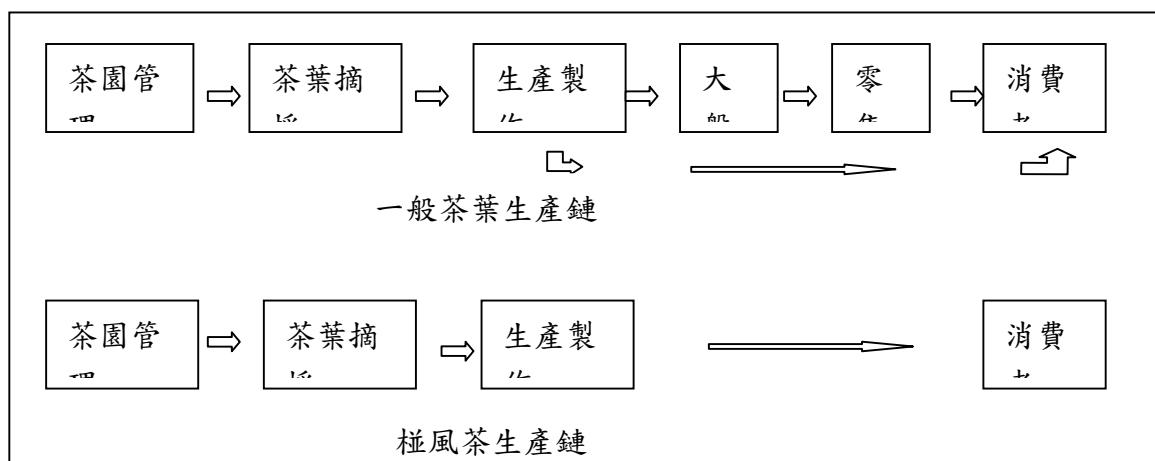
北埔地區近年來不斷的研發創新，在口感上與技術上提出地方的茶葉品味與論述，而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特色，就是比賽制度的改進。台灣各地的茶農事實上也都不停的與時俱進，提出新的生產方式與口感。但北埔有一點最特殊之處，在於他透過一個集體的在地力量，去改變茶葉比賽的方式。因爲茶葉比賽的方式是影響北埔地區茶產業生產鍊的重要關鍵。

要瞭解北埔的茶產業發展現況，必須先瞭解茶產業的生產鍊。北埔地區的茶產業生產過程大約是如何一個過程？北埔與外地茶葉生產過程有何差異？圖 4-5 是一個簡化的生產分工過程。它最主要表達的是茶菁撿選與摘採的重要性；第二是槿風茶在生產鍊上，並沒有一般茶生產鍊慣有的盤商空間。茶葉摘採的重要性與槿風茶的特性有關，因爲槿風茶的原料必須是遭小葉綠蟬咬噬過的嫩芽，因此這部份的工作不可爲機械取代，而必然會投入昂貴的勞動成本，使槿風茶的生產成本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就缺乏盤商空間而言，這可附帶澄清兩個茶葉生產的迷思。在一般農產品生產的過程中，消費者會在天災、豐年或農損後發現，產地價與市場價的價差過大，而導致對盤商剝削的印象。其他農產品的此類現象不在本

文能力範圍，但是一般消費者對農業生產鍊中的中間商，均有不事生產，坐取利潤的印象，一般人遂產生兩個迷思：直接向茶農買茶較便宜(同樣品質水準)；或直接向茶農買茶較有品質(同樣價格水準)，或直接向茶農買茶才買的到真正的好茶(不必然同一價格水準)。這樣的迷思反映消費者認為盤商在生產鏈中並無價值生產的功能，甚至它們連加工與保存的功能亦不重要。他們只在運輸與分配上略效棉薄。

北埔的椶風茶產業並無盤商空間恰為澄清此一迷思的範例，因為北埔椶風茶的生產分工上，並無盤商的空間。大多數的茶農是透過個人的人際網絡販售椶風茶。因此市面上椶風茶並無批發價與零售價的差異。在椶風茶與一般茶葉的生產鍊上可以清楚的顯示此一地方產業的特性。然而此一特性卻對消費市場產生了一個額外的現象，椶風茶品質與市場資訊的貧乏。

椶風茶的生產無法標準化，每年的水準無法穩定，茶農也無法保證，可以年年生產出風味一致的茶葉。因此維一的方式即是至茶農處試喝再購買。但是這樣的方式費時費力並不可行。這導致椶風茶市場價格資訊混亂的結果。盤商的功能即出現在此，他為一般茶市場作品質管制，分級與篩選的工作。這樣的工作有助提供消費者一個市場資訊，並有助產品分級，形成一穩定的市場運作，與價格機能運作的可能。在其他的茶葉市場中，比賽扮演一個相對不重要的角色，而比賽的結果也多是榮譽性質(亦有提高茶葉價格性質)。



性農糧網絡後，本研究

圖 6-1 槿風茶與一般茶生產鍊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北埔地區的槿風茶缺乏盤商做市場調節、分級與提供商品訊息，促進價格機能的作用。此時比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比賽選出特等、頭等、貳等、三等不同等級。凡入選者都可因比賽的保證，而得到市場明顯的價個位階。而餘下未入選者，再依慣例形成評等之下的價格位置。槿風茶的品質治理過程中，它的品質、口感一直依賴比賽來做定位與定價。這樣的治理關係中，評審掌握非常大的權力。南投生產的蜜香茶，即為評審為區隔槿風茶，而將評比標準設定，避開槿風茶的口味。這種特定的治理過程既不是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也不是消費者驅動(consumer-driven)。

北埔地區的茶葉比賽是一個相對系統的賽制。每次的茶葉比賽會選出一定數目的特等、頭等、二等與三等的茶葉。它是一個相對賽制，所以不論今年的品質如何每年都有定額的名次。我們亦可以說，是這樣的賽制大致上使得北埔每年的茶葉收入被固定在一個一定的範圍。因為每一個名次的價格不變，而每一個名次的數量又是固定的，所以北埔的每年的槿風茶收益是固定的（槿風茶因為製作方式的限制，很難大量提高產量）。而這樣的賽制也限制茶農的發展，因為總名次與總價格被鎖住，使茶農較缺乏改進的誘因。近年來北埔的茶農希望能朝向類似法國的紅酒品質分級的方式，而不是以固定名次、排名、分級的方式來比賽。地方農民因茲事體大，尚未去更動槿風茶比賽的賽制，但他們已在冬茶的賽制上調整比賽方式，不再採固定名次、數目的賽制。原有的賽制固定名次的數目，所以每年都有頭等茶，但每年頭等茶可能品質不一。此種賽制造成有不同年份三等超越某一年份頭等的可能。此外因為名次數目固定，也有可能優質茶低售，或一般茶高售的現象。在冬茶比賽試辦不限定數目後，北埔的茶葉進入名次的數目增加，提高茶農改進的誘因。同時因為高價比賽茶的空間加大，使得北埔全年的茶葉營收增加。

一般茶的比賽制度不適用於北埔，主要是因為經營規模與尺度大小的差異。北埔的茶葉比賽一般只有上百點，而全縣的比賽也不過五百點，無法與鹿谷的五千點相提並論。像鹿谷的大規模比賽，比賽的成果入選者的名次不會影響地方的總收益。在一個五千點的比賽規模之下，品質與名次的分配並不會出現如北埔優質茶低售，或一般茶高售的不穩定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型比賽有比賽量的優勢，不同年間的品質差異較穩定。此外大的茶區另有盤商在作品質管制與分級的輔助，但北埔的茶葉市場則無盤商作品質治理與管制的動作。

北埔的賽制創新的另一個原因，是希望能夠改變品質的品評標準。由傳統理論的觀點來說，比賽的理論意義是提供一個**價值-價格**的連結，是一個市場傳統：此傳統提供一個茶葉的味覺與嗅覺享受的市場價格標準。北埔的農民指出這些年台灣的茶葉定位往高山茶香的輕發酵移動的趨勢非常明顯。北埔傳統「紅水」茶湯經由評審的口味轉向「青水」的趨勢明顯。這挑戰了茶農的做茶方式，走向輕發酵的態勢。同時也使得茶工摘採茶菁有越來越嫩的趨勢。茶菁摘採越嫩，則單位面積產量越少，勞動成本則相對提高，使茶農的利潤減少，而影響整個產業的營收。比賽的口感因此影響了地方的經濟與茶園的管理與生態。

第七章 結論

地方發展是動態的，如果原有商品繼續維持優勢，地方沒有動機轉變其商品生產，而地方發展也將維持原貌。地方發展的轉型來自於其商品生產的競爭力變化，在商品轉換後將造成地方與其關係空間的轉換。在 70 年代到 90 年中期生產東方美人前，地方茶葉失去競爭力，茶園面積縮減，產量減少，勞動力轉移到其他部門。生產槿風茶後，北埔形成商品轉換與空間的再結構。

槿風茶的生產對地方而言，是一個再發展的過程。然而這樣的過程，由調節理論的觀點視之可解釋為是一種經濟關係的改變(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轉向至後福特主義的替代性農糧網絡(AAFNs)的建構)。這樣的經濟生產關係改變之所以可能，不僅僅只是市場商品的改變，也是普遍的社會關係、體制隨之改變、互動所致。

北埔由發展觀光到整個地方發展的轉型可以說是一個關係空間解構與在結構的過程。本文以茶葉的生產為例發現北埔早期的茶葉生產到現今的茶葉生產產生了一個質與量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在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生產鍊理論，傳統理論的架構之下產生出一個重組關係空間的例子。

北埔早期的茶產業係在一個福特主義下的生產方式下以生產、加工、銷售分離的現象。北埔的茶業生產過程中，地方的特色並不明顯。隨著台灣的茶產業沒

落，北埔的茶產業也隨之沒落。北埔近年推廣槿風茶。槿風茶產業形成一個振興地方的地方產業，但這樣的發展也產生一個意外的瓶頸。槿風茶的茶產業因作物的特性無法提升也使得地方的生產、銷售別有特色，必需透過茶農的人際網絡才得以銷售。

北埔的槿風茶產業形成一個以比賽為主導著的生產鍊，這個生產鍊因為外地的生產與市場傳統使北埔的產區形成一去地方化的過程。透過地方提出一個新的品質治理機制，北埔嘗試建構出一個劇地方特色的產區（Terroir）

簡言之本研究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 1.北埔的茶生產鍊為一中間驅動，比賽主導的生產鍊。
- 2.比賽扮演品質治理的主導角色。
- 3.盤商制度的功能在於提供商品資訊與分級，但它的形成與市場規模有關。
- 4.比賽制度代表品質的傳統（Quality convention）而它的移植會改變地方的社會經濟、生產與生態。
- 5.藉由建立新的賽制，北埔以地方傳統建構地方茶產區（Terroir）。

地方發展變化與轉型的過程中，地方將如何因應呢？不同的地方在形成關係空間時地方如何回應網絡的鑲嵌過程呢？傳統理論可以在此回應上述的疑問。地方有其歷史、文化與社會的條件所形成的傳統，關係網絡並未直接結合地方，它是鑲嵌在地方的傳統之上。Marsden 另外未能處理的概念是商品，因為在一般的農產品中，商品蘊含了一定的農產品的地理關係，這種關係可能包含了農產品與自然環境、氣候、地理等條件，另外也包含了某些農產品的人文、社會關係。

當兩地之間形成一個生產的關係空間時，它們不必然具有地理鄰近性，反而是生產關係的關係鄰近性影響它們的相互依賴與互動，而它們所在的地方治理會因為它們形成一個新的關係空間，必須相互調適，否則無以穩定它們之間的關係。例如遠洋漁業中的漁場主權國家，漁船的擁有國與消費市場所在的國家在消費某種魚類所形成的治理若無法協調，則這種關係網絡勢將無法維持。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結合空間與發展的概念，提出商品化帶動關係空間的觀點。在地方發展的回顧下，這樣的觀點可能過於簡化，因為地方的生產與商品可能是動態的過程與多元的商品，而這樣的過程似乎無法以單一商品來說明。因此在應用

Marsden 的理論時，對主要商品的討論可以釐清地方發展的變遷，但事實上，應當謹慎看待地方發展與商品化的複雜的互動，與不同的商品如何競爭土地、勞動力、與資本等資源的治理過程。

引用文獻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95-120.
- Davies, Anna R.(2002) “Power, politics and networks : shaping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 *Area*, 34.2: 190-203.
- Healey, Michael J. and Ilbery,Brian W.(1990) *Location & Change*.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rmo Kortelainen (1999) ,The river as an actor-network:the finnish forest industry utilization of lake and river systems,*Geoforum* 30(1999)P.235-247
- Marsden, T. (1998) *Economic perspectives*. In B. Ilbery (ed.).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gman: London.
- Murdoch, J. and Miele, M. (1999) “Back to nature’ : changing ‘worlds of production’ in the food sector. *Sociologia Ruralis*, Vol. 39, No. 4: 465-483.
- Murdoch, Jonathan ,Terry, Marsden and Banks, Jo(2000) “Quality, Nature, and Embeddedness :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od Sector” ,*Eco.Geo*,76(2).
- Murdoch, Jonathan(2000) “Networks —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07-419.
- Murdoch, Jonathan, (2000) *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6: 407-419.

- Murdoch, J., Lowe, P., Ward, N., and Marsden, T. (2003)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 Parrott, N., Wilson, N. Murdoch, J. (2002) 'Spatializing quality: regional protection and the alternative geography of food'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 (3): 241-261.
- Peter, Dicken, Philip F. Kelly, Kris Olds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Networks* 1,2(2001) P.89-112.
- Putnam, Robert D, (1993a)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3b)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 35-42.
- Putnam, Robert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664-683
- Rydin, Yvonne and Pennington, Mark (2000)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planning :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nd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capital*. *Local Environmental*, Vol. 5, No.2, 153-169.
- Stan B-H Tan,(2000) "Coffee frontiers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Vietnam : networks of connectivity" ,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1,No.1: 51-67.
- Storper, Michael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Storper, Michael (2004) *Society,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Elsinore, Denmark, June, 14-16, 2004.
- Woolcock, Michael,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151-208.
-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1996，新竹縣北埔鄉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新竹縣北埔鄉公所。
- 吳學明（2000）*金廣福墾隘研究（上）、（下）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林滿紅 (1975), 茶、糖、樟腦與晚清台灣經濟社會之變遷 1860-1895,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林木連編 (2003) 台灣的茶葉, 台北: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滿紅 (1999) 台灣商業經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以近四十年台灣相關研究為基礎之省察。見黃富三、翁家茵主編, 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 頁 1-44。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譚鴻仁 (2007), 關係空間與鄉村發展以龍潭椏風茶產業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 50:1-26。

新竹縣統計要覽, 新竹縣府。